

我钻进了金字塔

序

张中行

近年来我感到日暮途穷，生活成为大部分时间面对稿纸，目光很少射到一尺以外，以致连唐老鸭（学校注册和身份证之名为唐师曾）这样一位性格奇、造诣高、成就大的人也毫无所知。后来有了所知，是他找上门来。大致是去年夏天，他来个电话，说姓唐，新华社记者，想来采访我，向海外发一篇介绍。我说我没什么成就，往远地吹嘘更不合适，还是以不如此为是。他不退让，并拿出新武器，说他也出身于北京大学（1983年国际政治系毕业），采访向海外发是他每月一次的任务。听到同出一门，我只好退让，说欢迎来谈谈。不久他来了，门开处，一米八几的大个儿，最上部是长而秃的头，使我吃了一惊。坐谈了一会儿，拍照了一会儿，我的印象由惊奇变为亲近，觉得他为人憨厚，对一切事都特别认真，简直近于痴。告辞前留下一张名片，因为我眼既昏花又缺少注意力，只觉得上面还有个似曾相识的漫画，究竟表何意，未想就放过去了。

很巧，之后不久就见到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工作的高莉笑女士，闲谈触及采访的事，她说那就是新华社有大名的摄影记者唐老鸭，人很有意思，新闻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如梦初醒，找出他的名片看看，原来上面的漫画就是与米老鼠齐名的唐老鸭，只是胸前多个像机。原来的印象未变，加点新的，是立身处世还不少风趣。又是不久之后吧，他送照片或已刊于报刊的照片兼文，还带来他1994年出版的一本《我从战场上归来》。这本书是写他在海湾战争中的采访情况的，其时我正忙，只看了其中的几十幅照片，书就被更想看的友人拿走了。

“还书一痴”，到我想看的时候，只有向老鸭呼叫。很快又送来一本，我看了。

有什么感受呢？

除了对于书，比看小说更加感到新奇以外，主要是对于作者原来的憨厚或痴不变，要加上许多新东西。占首位的是胆量希有，海湾战争，现代化武器的烟云之下，出生入死，他总是乐呵呵的。其次是事业心强，为抢几个镜头真是连命也不要了。其三是还多有机智，异国有异，而且是战时，困难甚至危险多到数不清，靠他能够随机应变，都化险为夷。

还可以加个其四，是不愧为北京大学出身，而且学国际政治的，域外许多国，史，地，统治阶层，人民生活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化为文字就能内容丰富而确凿可信。他是摄影记者，摄得之影也就多值得欣赏，这本记海湾战争的，第206页有个“爱国者”弹道导弹轨迹之影，第127页有个“生离死别的以军恋人”热吻时之影。我见到，就真想揪住老鸭问问：“这都是万钧一发之际的瞥见之景，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还没来得及问他，他又登门，送来一部书稿，总有十几章吧，仍是记国外采访情况的，所以取名为《我钻进了金字塔》。他说书已在印，希望我看完写几句，为同学助助威。

能写不能写再说，总可以先睹为快了。于是翻开看。正文十六个题目，

可见写法要化零为整，想法大概是，不说则已，说就说个痛快。果然是折子戏变为整本戏，看也就可以看个痛快。正赶上我将外出，未能篇篇俱到，只是看了几篇特别感兴趣的。语云，尝一脔而知一鼎之味，也就可以说说新的一些心得。已经写过的优点不重复，说这未问世的一本里使我看时兴奋、看后念念不忘的，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几乎没有想到，对于异域的各方面，他竟有如此丰富的知识。以《铸剑为犁的拉宾》一篇为例，写拉宾的经历和突出的成就，可谓面面俱到，巨细不遗，简直使我有个感觉，是根据这一篇，可以为拉宾写个简要的年谱。其中写往乌干达救人质一事尤其使我感兴趣。这个看似神话的举动我在某期刊上见过，说得比较概括，到老鸭的笔下，一切都化为具体，连谁指挥，如何化妆，用什么枪打都说到了。这样写，就使记实而能有戏效果，所以干脆就走入剧场，不能不高喊一声：“好！”。二是还善于剪裁，能取重舍轻，常常不乏画龙点睛之笔。仍以写拉宾的一篇为例，拉宾是政界大人物，所行或所记应该都是会场上或战场上的大事，可是这位老鸭也述说了与丽哈恋爱拖延的事，不穿防弹背心以致被刺身死的事，这看似闲笔，却既可寓褒贬又可增情趣，取得开卷如“漫游奇境记”的效果。三是更想不到，他不是学文的，却常常显示有雕龙的巧技。稍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诌文，开头难，结尾更难。我看了这本书稿的第一篇，讲见卡扎菲的，就很欣赏那段结尾，照抄如下：黄昏，我们的总统专机从班加西机场直冲蓝天。我平躺在专机惟一的一张沙发床上，想象卡扎菲上校躺在这里的情景，耳边回荡着红袍恺撒的一句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窗外是波涛汹涌的锡尔特湾，远方，残阳如血。

“我来了，我看见了”，等于用画笔画出他的性格。后面还有“残阳如血”，是掺杂一些轻微的惆怅吗？难说，此之谓余韵不尽。能如此，高手也，应该赞扬。如何措辞呢？想借用胡博士在红楼里常说的一句话，“北大不愧为大”，能够养育唐老鸭这样既能拿像机又能拿笔的。

1998年4月1日于元大都北郊

自序

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病房里坐井观天闲肌难耐。医生让我静养，可每到子夜，所有电台都说完晚安之后，我还在双目圆睁怒视天花板。我一直拥有大牲口般的健康，低地高原、严寒酷暑、战场疫区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可现在从外到里都令人忧虑。首先我的右腿受伤后未及时就治，至今周长已比左腿细了两寸。以后发现，心肺肝胆都与常人不同，当301医院建议我摘去萎缩的胆囊时我大叫不可，人可以无心不可以无胆。X光、B超，肝胆相照之后我肝火上升，见谁都有气，把身边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一遍。此时我的白血球仅为2600，不足常人的一半。

一个月内我撅着屁股在北京医院、301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连续做了三次骨穿一次活检之后，显示的特征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合演的《血疑》中的“不治之症”，医生怀疑我受过核辐射污染。我不断变换卧姿，幻想有林妹妹跳出来让我敲骨吸髓。可面对我这个四处生事的大白胖子，所有人都摇头说不大可够，我自己更深信这纯属无稽之谈。因为1990年在海拔6860米的布堪、峰下，西宁高原生物所的医生为我验血时，说我的血在68人中足以与出生在沱沱河的藏人恰加媲美。

那年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半年的野外生活，我认识了《民报》的记者凌

风，在高原寒风掀动的帐篷内，他每天不辍给三岁多的儿子写信。听他讲，他的儿子叫凌晨。从此高原旭日金黄的暖光照进帐篷，我都想起这个名字温暖可爱的孩子。于是我第三者插足，给他们父子的信画插图。吉普车追藏野驴，爬冰塔林，还有千奇百怪的高原生活。我羡慕他和他的儿子。

光阴荏苒，到 1994 年我从中东回国时小凌晨已 8 岁。

是轮到我为他写的文章画插图。除天赋之外，小凌晨更多的是善良。每次得知我受伤、生病、失恋或诸多不如意时，都会令他伤心得大哭，并旗帜鲜明地向一切伤害我的人、物开战。去年我一人驾车环绕美国，他特地从五台山请来护身符让我带在身上，保我平安而归。

郭沫若《棠棣之花》里有句台词：“有了好的母亲，才有好的儿女；有了好的儿女，才有好的国家。”凌晨的母亲是恢复高考头一年考进北大中文系的，据说当年同班的凌风慧眼识珠，以“不成功便自沉未名湖”相要挟，才把我这位善良的师姐弄到手。

母校百年华诞，CCTV 两套人马找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动员我再次露脸为母校效力。《世界博览》主编任幼强也动员我把这几年的辛苦整理一番，献给我们的母校。为母校祝寿，儿子自然尽力。

可惜我百病缠身，拖着输液瓶在纸上乱画，连派克 45 型钢笔的钢杆都被我捏断过两根……心灰意懒有如诺曼底之战后受伤住院的隆美尔。其实还有几篇如《家在开罗》、《贝鲁特绿线》、《长长的尼罗河》、《戈兰高地》、《该不该修阿斯旺水坝》等正在炮制之中。

时至今日 4 月 1 日，离北大百年华诞“五四”大典仅剩一个月，而我病体孱弱，显然无力完成学长们布下的作业。

取名为《我钻进了金字塔》很合我现在的处境。外人以为我事业如日中天，正勇攀金字塔顶，其实我肉身已处于地层深处。更深夜静扪心自问，大概是当年在开罗年轻气盛，乱闯金字塔，惹恼了当地头号大法老，祭起法老符咒，压得我从此永无出头之日。特长荒废，鸡飞狗走，事事不顺。进而浸身身体，以至今天愚人节还趴在手术台上，再一次骨穿取活体。

一阵毫无警告的剧痛之后，麻药麻痹了整个后腰，大脑却清晰如刚擦过的玻璃。回首往事，或许海湾战争在伊拉克的半年中，我的确被人辐射过……

唐师曾

1998 年 4 月 1 日

于北京军区总医院骨穿之后

第 1 节我见到了卡扎菲

新华社记者独得签证

我真不愿将好朋友“断腿巴利”扔在开罗，自己去闯利比亚，这与我朋友两肋插刀的信条不符。利比亚驻开罗使馆几次警告我离美帝远点，我上司也严令我不要再惹是生非。当我怀揣利比亚入境签证，与分社英文记者润哥爬上开往利比亚的长途汽车时，我还在为没能帮“断腿巴利”弄到利比

亚签证而自责。

我第一次听说“断腿巴利”还是海湾战争正酣之际，当时我正单枪匹马地从“飞毛腿”横飞的以色列绕道塞浦路斯、埃及、约旦重返巴格达。我的北大老校友、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一见面就交给我一封信，还关照道：“这可是美国来的！”能在烽火连天的巴格达看到扔炸弹的美国人的来信，本身就挺幽默。信是美国摄影家、因拍摄艾滋病成为世界新闻摄影大赛金牌得主的阿龙·瑞宁格来的，他对我“刚在纽约出版了熊猫画册就半途而废地参加海湾战争”大的不满。阿龙在信中列数战争的几大罪恶，劝我离战争越远越好。知道我为人固执，他还连篇累牍地举了一大堆例子，其中就有他的好友《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在贝鲁特打断了一条腿。阿龙力诫我要珍惜小命，最好还是回秦岭去寻找大熊猫，或是重返可可西里探险队继续我的世界屋脊探险，可就是别碰该死的战争。最后，他托我有机会路过开罗时，千万别忘去看一眼“可怜的断腿巴利”。

可足足拖到1992年4月8日，在开罗采访阿盟外长紧急会议，我才碰上胸口别着Time徽章、头戴牛仔帽、一瘸一拐的“断腿巴利”。我走过去说：“打扰了，我猜你就是断腿巴利，我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阿龙的朋友。”巴利斜起眼睛用西部片中才有的姿势从下到上打量我一番之后，才猛拍了一下我的左肩，用中文说：“知道，阿龙说你总穿红色的。”我正惊讶他怎么会中文，他竟像我为我的北大自豪一样，炫耀道：“我在哈佛学过中文。”

年石油收入为上百亿美元的利比亚处于阿拉伯世界核心位置，面积辽阔，国土比三个法国还大。可由于人口不到400万，政治上无法与东邻埃及相比。卡扎菲上台后主张阿拉伯团结统一，为此他先与萨达特的埃及联合，接着同叙利亚、苏丹联合，可都告失败。此后他转向马格里布非洲，先后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签订条约，可实际上仍是一纸空文。

由此卡扎菲对联合阿拉伯国家感到失望，把伊斯兰前途放到黑非洲的萨赫勒国家身上，企图建立乍得、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利比亚的联合合众国。怨恨西方霸权国家的同时，卡扎菲更对阿拉伯国家的长期分裂十恼火，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觉得自己有理由对利比亚表示不满。1984、1986年里根两次派空军袭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殃及许多平民，但世界上站出来为卡扎菲说句公道话的国家不多。现在，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借口1988年苏格兰洛克比坠毁的一架泛美航空公司飞机是利比亚特务做了手脚，命令卡扎菲交出涉嫌的有关人员，卡扎菲置之不理。联合国安理会为此通过了748号决议案，由于卡扎菲拒不执行联合国决议，联合国从1992年4月15日起对利比亚实行空中封锁。连利比亚的邻国突尼斯、埃及也准备加入对卡扎菲的制裁，这令自视为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的卡扎菲大惑不解，万分沮丧。

根据这位大漠英雄的一贯表现，我坚信他一定会不失时机地宣示立场，他不仅拥有无可抑制的表现欲望，而且具有这方面的天赋。

随着4月15日安理会制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生效日的迫近，各国记者纷纷跃跃欲试，伺机进入利比亚，可利比亚却迟迟不肯给外国记者入境签证，引得各国记者成群结队地围着利比亚驻开罗使馆打转，还彼此猜忌着，生怕对手抢了先。断腿巴利拖着那条在贝鲁特被打断的右腿，开着“七九”式美军吉普，一日三遍地往利比亚使馆跑。由于空中封锁，民航中断，即使有签证，也很难穿越几千公里的撒哈拉沙漠，到达利比亚。为此，断腿巴利正组织一支吉普车队，准备结伙远征。由于有阿龙·瑞宁格的推荐，我开着

我的三菱---山猫加入了巴利一伙。巴利用力拍着我的三菱，大喊：“瞧！鸭子有辆好车，这车可得过巴黎---达喀尔拉力赛第一名。我们要一直开到黎波里！”

可直到4月12日中午，利比亚驻开罗使馆却只给新华社一家发了签证，馋得几十名老外大眼瞪小眼。断腿巴利可怜巴巴地挤在人群里，竭力装出一副潇洒样，可话到嘴边却带了哭腔：“鸭子，一个人当心点！”

穿越撒哈拉的两夜

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令我和英文记者润哥吃尽苦头。由于没有航班，我们不得不从陆路辗转到边界，再假道托布鲁克、班加西，紧贴着撒哈拉沙漠的边缘一直向西。分社社长断然拒绝了我驾车穿越撒哈的计划，因为同行的润哥不谙驾驶，我一人在沙漠中连续开车缺乏安全保障。

嗅着沙漠的气息，我仿佛又回到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正伙同巴格达使馆的弟兄们驱车横穿伊拉克沙漠。可眼前二十人挤在臭烘烘的公共汽车里，既无昔日轰炸的刺激，也没有自己开吉普可随心所欲的浪漫，一想到要熬过48小时才能到目的地，我恨不得一口气憋死。我这人嗜吉普车如命，当年我在驾校学的是吉普、秦岭林海追熊猫坐的是吉普、青藏高原探险开的是吉普、海湾战争中往返巴格达---安曼是吉普。我喜欢开吉普探寻无人涉足的小径、体会妙不可言的冒险乐趣，在干涸的河道的浮沙上露宿，让滚烫的流沙埋过赤裸的躯体，洗去长途驾驶的疲惫，只有令人窒息的喀新风（沙漠热风）才能使我体会母亲怀抱的温馨。

出亚历山大西行113公里，即著名的阿拉曼战役旧址。

50年前的这个季节，德国最年轻的陆军元帅隆美尔从利比亚向东直线推进2000公里，进逼苏伊士运河，与英军大战于阿拉曼。我们的大巴士正沿着当年隆美尔且战且退的海岸公路行进，路两侧成群的无名战士墓沉重肃穆，令我从枪口冷钢得出无限遐想，冥冥寒夜中隐约听到隆美尔北非军团的熄灯号声。

终于熬到彤云散尽、旭日东升，大巴士在蛇腹形铁丝网间穿行，不知不觉正通过边境。

留下润哥“看堆”，我一人肩扛手提相机、放大机、传真机去报关，看到两位长官无休止地下国际象棋，我忍不住建议中校用皇后去吃对方的马，由此引发一场鱼死网破的厮杀，了却残局。

进入利比亚境内，并未遇到海关、边防站之类的任何阻拦，因为利比亚民众国把所有阿拉伯国家视为自己兄弟，故无国界。沿海滨公路西行，碧波万顷、彩霞满天，连绵不断的橄榄林、金黄的草场。白顶的农舍、蜿蜒其间的水渠和一望无际的紫花地丁，宛若列宾油画中的俄罗斯。唯有每逢路口，高高竖立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画像才提醒你眼前就是利比亚。路旁的路标和交通标牌已被白油漆涂抹得看不出所以然，据说是防备以色列特种部队和美国入侵。

中午，我和润哥钻进撒哈拉沙漠边缘一家无名小店，徒手吃了只比野麻雀大不了多少的阿拉伯烤鸡，连吃两大盘盐水煮蚕豆，总算填满了肚子。

下午两点半，大巴士缓缓驶入班加西，乘客奉命在一处遍布垃圾的广场下车。我和润哥以及另外五位要去的黎波里的乘客被集中起来，一位穿皮

夹克的大收走了我们的护照和车钱，答应为我们七人安排一辆小车继续走完剩下的 1100 公里路程。可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还蹲在大垃圾堆旁望着往来车辆荡起的遮天蔽日的尘埃。

终于盼来一个长着一双桃般火眼、穿着件脏得无法辨认本色的长袍的胖子，他自称是内务部管查验签证的。胖子端起我们的护照瞪着火眼琢磨良久，又紧贴到我们脸前，逐一辨认我们的面孔，逼视得我跟着他一起迎风流泪。

我们被塞进一辆丰田工具车，原说只坐 7 个人，可此时竟塞进来 17 个。我那条困受伤萎缩的右腿不得不蜷到粗壮的左腿下寻求保护，膝上握着传真机和装了尼康 F3 及 6 个镜头的器材包，由此开始了下一段 1000 多公里的旅程。

夜幕降临沙漠，汽车又莫名其妙地没油了，沿途所有加油站全关了门，以纪念美国轰炸利比亚六周年。1986 年 4 月 15 日，美国空袭阿齐齐亚兵营，致使包括卡扎菲养女在内的 41 名利比亚人丧生，从此，每年 4 月 15 日，利比亚全国海陆空交通、通讯全部关闭以示悼念。

虽然刚晚上 9 点，可撒哈拉大沙漠的夜风已利刃刺骨。

我只穿了条单裤和一件红背心，白天挺风光，可此时真羡慕阿拉伯兄弟的长袍和裹在身上的羊毛毯。与 17 名乘客同车共济，我绞尽脑汁变换着大腿小腿的位置，调整坐姿，将身体倚靠到别人身上，以争取尽量大一点的生存空间，从腥膻汗臭的毛毯上分享一丝一毫的温暖。润哥耐不住性子，持护照找到加油站，声称自己是卡扎菲上校的客人，可人家连眼皮都没抬：“那让卡扎菲接你好了！”

终于熬到午夜 12 点，几百辆车蜂拥着挤进恢复营业的加油站，碰撞怒骂之声不绝于耳。我们车上由于有 17 条好汉，抢油泵的、堵别人车的、大打出手的、叫骂助威的各显其能，自然抢在最前面加满了油，得意洋洋上了路。

经过打架、发动机漏油之类天灾人祸停停走走，到 4 月 15 日下午两点，我们经过 45 小时的长途远征终于驶进的黎波里，我和润哥满脸泥垢，眼窝发青，两腿发软，钻出汽车几乎跌倒。

我拍制裁下的利比亚

早就听说利比亚是个不许随便拍照的国家，但想不到比我在海湾战争中经历的伊拉克更甚。我的一位朋友曾因身背相机在的黎波里街头徜徉而被勒令交出胶卷，理由是“尽管你现在没拍，可谁知道你刚才拍了什么”。为了防备美国、以色列入侵，的黎波里街头所有的交通路牌全涂上了白漆，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我们在安理会空中封锁利比亚的 748 号决议生效之日抵达的黎波里，深感乌云压城的气氛。

清晨，我与润哥及由突尼斯赶来的阿文记者小拱驱车赶赴的黎波里机场，采访空中封锁头一天的反应。为避免保安人员注意，我将挂在脖子上的尼康 F3 紧贴到肚皮上，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暗中偷拍了张机场外景。走进机场候机大厅，国际候机厅冷冷清清，所有的航班起降显示牌全是空白。利比亚航空公司飞往罗马、开罗、苏伊士的航班全被拦截。到问询处打听能否乘飞机回开罗，回答是：“要么坐般到马耳他转飞机，要么开车到突尼斯吉尔巴岛换船。”

我发现一位穿阿拉伯传统服装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呆坐在候机厅一角，便凑上前去搭讪，称赞孩子长得美。博得好感后，端起装 24 毫米广角的尼康 F3 连拍了两张。可还没等相机马达噪音散去，一只熊掌般的大手抓住了我的左肩，连拉带拽地将我推进墙边的一扇小门，我只看到润哥和小拱两张扭曲的白脸一闪便消失在门口。

我被两个彪形大汉按在墙上，脖子上的相机已被夺去，任我拼命蹦跳挣扎，放声用阿文大喊：“我是中国记者！”可就是无人理睬。我像条被钉在门板上的鳝鱼，明知反抗无用可还是不停地挣扎。直到过了一刻钟，一位西装男子走进来归还我相机，我才安静下来。相机完整无损，可里面的胶卷已被曝光。我被简明扼要地告知：“立即离开机场。”

返回我居住的中国大使馆，一肚子怨气没处撒。我的老板、新华社摄影部主任说过的一句话总在我耳边炸响：“永远别跟我解释为什么没拍到、为什么没拍好。我只问你要新华社传真照片。”

次日清晨，阿文记者小拱说利比亚新闻部要求摄影记者马上到海门饭店集合。我撒腿就往楼外跑，不小心正踏在一根废钢筋上，只感到右腿一麻。低头看时，断钢筋刺穿彪马运动鞋帮，直抵右脚腕，血流如注。我从摄影包上扯下一段胶布，先缠脚后缠鞋，单腿蹦着上了车，小拱问扎得怎么样，我硬挺着说没事。

急急忙忙赶到海门饭店，可什么人也没有。大堂里小个子路透社摄影记者哈米正一人半躺在沙发上，我问他是否拍了什么好照片，他说拍个屁。哈米是突尼斯人，说一口漂亮的阿拉伯语和法语，他说我可以无偿使用他设在海门饭店 1345 房间的暗室。哈米曾要求拍摄机场、海港和使馆区，可答复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他朝我撇嘴、耸肩、瞪眼：“咱们干什么来了？”当他听说我昨天在机场被曝光后哈哈大笑：“把胶卷裁短些，每卷五张。”

一直耗到中午，新闻部的一位官员才将我和开罗电视台驻利比亚的记者塞进一辆旧奔驰，直驶一个不知名的自由市场。这个市场足有一个足球场大，摊上摆着菜花、生菜、洋葱、土豆、西红柿和比拳头还大的大蒜头等蔬菜。由于货多人少，商品显得格外丰富。我对站在身旁的陪同说：“封锁没给利比亚人民造成困难。”他挺胸点头连称：“正是”。这时，一个老头子风风火火地扑过来：“中国人，中国衬衫好，洗完了没褶子。”边说边伸出利比亚传统马甲下的白的确良衬衣底边让我摸。引得一帮外国记者围着我看热闹，其中一个小胡子喊我“新华”，我见他眼熟，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那儿见过他。可这家伙还让我使劲想，直到我痛苦了半天，仍毫无希望才一语道破：“在巴格达，你用过我的底片传真机。”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是法新社的摄影记者拉比。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们曾一起采访过伊拉克政府军镇压库尔德叛乱，想不到今天在利比亚又久别重逢。

拉比的热情丝毫不减当年，拉拉扯扯地把我引荐给美联社摄影记者尤瑟夫，还有我早上刚认识的路透社的哈米。

男人们聚在一起，其破坏力量按几何级数增长。以追逐热点新闻为生命、频频与死神接吻的摄影记者尤好争强斗狠。

当下众人起着哄要求多拍些地方，法新社拉比被推举为代表去与利比亚人交涉，但任凭他巧舌如簧，还是毫无结果。

我预料这帮好汉们已经黔驴技穷，于是独自返回中国大使馆另辟蹊径。司机王小立见我空手而归、神色黯然，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各国使馆送文件，

说不定能“逮”个一张半张的，我想也没想就跟他上了车。

我们直奔俄罗斯使馆，三辆被砸毁的外交车还歪在俄罗斯使馆门前，这是10天前抗议俄国支持空中封锁利比亚的人们的“杰作”。我隔着车窗哆哆嗦嗦地连按两张，王小立瞥了神色慌张的我一眼，壮着胆说：“没事儿。”

我们径直开进委内瑞拉使馆院内，一群荷枪实弹的保安人员立即将我们的大奔驰围在核心，吓得我赶忙把相机夹在膝盖底下。10天前，当安理会通过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时，委内瑞拉碰巧是本届安理会主席，由此激怒了一批利比亚人，他们一把火烧了委内瑞拉使馆。

离开委内瑞拉使馆，眼前是雄伟的老王宫，我忍不住对准老王宫拍了一张，相机还没放下来，斜刺里冲出一辆奔驰280，一下子把我们的车别到路边，车里跳出两个穿军便装的大汉直扑我们的车。我挺紧张，准备随时交出相机，可王小立让我别动。只见他隔着车窗朝外面打手势，急得外面的军人犹如鱼缸外面的猫，围着我们连连打转，直到记下汽车的牌号，才说了声“OK”放我们走。

到孟加拉使馆送完文件，我们打算去买些点心，正撞上使馆会计开着小丰田迎面而来，他隔着马路朝我们大喊：“唐老鸭，你跪那里去了？快去机场，卡扎菲等着见你！大使都快急死了！”

“卡扎菲的专机在等你”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王小立已经一打方向盘跃上了公路。我将信将疑的问：“卡扎菲上校会见我？卡扎菲上校？”王小立斩钉截铁：“大使还能涮你！”大奔驰闪烁着双蹦灯以170公里的时速冲出的黎波里，加大油门的啸音如同F-14战斗机的火箭助推器一般轰鸣。我说：“哥们，我身上的胶卷全是五张一卷的，能不能回家取俩胶卷？”

冲进静悄悄的机场大门，穿过空荡荡的停车场。守候在贵宾室门口的几位利比亚官员正向我们招手：“是中国使馆的吗？”我来不及回答，抱着摄影包紧跟着他们冲进贵宾室。王大使一把抓住我：“鸭子可来了，我总不能老扣着专机不让飞呀！”一架苏制安-24马达轰鸣着停在空荡荡的停机坪上，这就是卡扎菲的座机。我们六人依次登上专机，想不到飞机上已有两位姑娘，一位金发碧眼，一位卷发黑皮肤。

坐在我对面的黑人姑娘一言不发，托腮的右手虎口有一块铜钱大的刀疤，她身着紫色连衣裙，脚登坡跟黑皮鞋，不论问什么，只是报之以训练有素的友好笑颜。我让小拱用阿文问她能否拍照，她说“听真主的”，小拱解释说这等于婉言拒绝，并让我把相机装回包里，堆在行李上，因为这漂亮的黑姑娘“神情紧张”。我几次试探着将手伸向相机，但可恨的润哥不停地捏我胳膊，让我别因小失大。

我转而琢磨起那位白皮肤姑娘。从我的位置侧角看过去，是一张标准的雅典美女的剪影。隆准、卷而奇长的睫毛、灰蓝色的大眼睛，眼窝深陷弄不清有多少双眼皮，皓齿如编贝，白天鹅般长脖子上挂着条精细的项链。一身退色的蓝月（BlueMoon）牌牛仔装，纤细的小手轻巧地搭在我面前的扶手上。秀发四处飘洒，几乎打到我脸上，清香四溢。我上前“套磁”，她自称叫“佳米拉·穆罕默德”，是的黎波里大学地理系的硕士生，对农业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追根寻源问我中国三北防护林的长度、宽度，是复合林还是单一树种、是针叶还是阔叶、是灌木还是乔木……可望着她那紧绷绷、满是腱子肉的小腿，我怎么也不信她是个女学生。我用右肘捣了一下润哥：“我敢打赌，她准是个女保镖。”说得他将信将疑。聊起1986年4月15日美国

借口西柏林夜总会爆炸案轰炸利比亚、可事后调查此事与利比亚无关时，佳米拉拍案而起：“41个利比亚人白死了，美国凭什么？”话题又扯回农业：“我们渴望中国的农业技术，中国蔬菜在这儿长得特别好。”我问佳米拉：“你不想去美国学农业吗？”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美国把我的同学全赶回来了，英国也不会给签证，说我们全是恐怖分子！”我们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去中国留学？”佳米拉两手一拍：“空中封锁，我去不了呀！”我打开笔记本，打算记下这段有趣的对话，可利比亚礼宾官示意我收起纸笔。

下午1点25分，我们的总统专机经过一小时的飞行，缓缓降落在班加西机场。30年前，这里曾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海空基地，可现在的机场静悄悄，唯有我们的小飞机蜻蜓般地滑跑。机场尽头树丛中，恍惚可见涂有沙漠迷彩的米格--23和苏-22雄赳赳地仰望长空。我们的总统专机在一个小车队前停稳，三辆奔驰300SEL和两辆面包车早已守候在这里。我们六人分乘三辆大奔驰浩浩荡荡冲出机场，以140公里的时速飞奔，我低头看了眼手表又抬头看了看太阳，我们正朝西南方向急驶。

我们被送进一座名叫Aozou的五星级饭店住下，大堂内出售的竟有福建出的“福达”彩卷。我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浴室自来水龙头，意外地发现这里的水竟然不咸，美得我扒光服痛快地洗了个澡。在此之前，我的头发被的黎波里的咸水洗得根根直立，一舔上嘴唇犹如舔老咸菜一般。可是没等我洗完，屋里的电话就响了：“你好，马上到楼下集合。”

卡扎菲对我说：“你能卖100万。”

大奔驰驶出Aozou旅馆呼啸而去，根据太阳方向我们正驶向东北，我见润哥紧张地抓住汽车扶手、青筋暴露，我自己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15分钟后，我们驶过一座竖有“移止通行”标志的大木桥，在一堵绿墙外停下。从我们的开道车上走下一个官员，与大墙下的门卫嘀咕了有两分钟，我们的汽车才缓缓驶入，沿简易沙漠公路缓缓而行，一扫刚才横冲直撞的雄风。四野是狂风劲草，大有藏龙卧虎之势。

草丛中有“丰田巡洋舰”“尼桑巡逻兵”“三菱大山猫”各色吉普，许多戴牛仔帽、提AK—M步枪的身影闪烁其间。再向前是一辆奔驰牌8吨油罐车、双联23毫米高炮和土黄色炮衣掩盖着的防空武器。我们奉命停车，等候警卫人员用步话机通知下一站，讨论是否放行。大约又折腾了半个钟头，我们终于来到一块阳光灿烂的开阔地，两辆长40米、载重50吨的巨型奔驰牌移动房屋拖车停在草丛中，附近是成群的绵羊和深棕色的骆驼。我早就听说卡扎菲到南斯拉夫参加不结盟会议时就带了一大群骆驼，因为每天他都得喝骆驼奶。青出于蓝，卡扎菲上校的儿子赛福·伊斯拉姆去奥地利留学随身带着佛利德、巴尔尼两只老虎。我们走出汽车，跟着持枪警卫趟着没脚面的枯草往前走，路尽头有一个风向标，脚下显然是一条轻型飞机跑道。

我们三个记者被引进一座四面镶有铝合金门窗的小屋休息，真想不到在烈日炎炎的利比亚大沙漠中竟能喝上美帝生产的冰镇百事可乐。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吃了一碗稀粥和两个“袖珍馒头”，此时饿得我恨不能挤进骆驼群中吃草。

下午4点整，我们穿过羊群，被引进一座开口向东的大帐篷，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北朝南坐在大皮沙发上的“九·一”革命领袖卡扎菲上校。50年前的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费赞省锡尔特地区一个卡达发族人家，21岁进班加西军事学院，25岁留学英国学习军事，27岁组建自由军官组织

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中提出了所谓的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并以此为论据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由于出身游牧民族，他主张没有等级的部落社会自然公平。喜欢住在帐篷里远离豪华住宅，喜欢骑骆驼。他推行部落文化和伊斯兰教的混合物，禁止饮酒和过分娱乐。现在，由于他拒绝交出 1988 年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的泛美航空公司疑犯而与世隔绝。在我眼中卡扎菲是力主阿拉伯团结的有远见的政治家，革命英雄、民族社会主义改革家。可在西方眼中，他是无恶不作的恐怖之首。我在电视上多少次看见过他的姿容，可眼前却是近在咫尺。

卡扎菲上校静坐在棕色大皮沙发里，两肘支在一张两米长、一米宽的白漆木桌上，正在认真地看文件，鼻尖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罗登斯德花镜，这位戏剧性的领导人一扫军人作风，变成了戴眼镜的学者，令我想起了托尔斯泰。我正想冲上去拍照，一只大手猛抓住我的右肩，一位便装男子附在我耳边低语道：“你只许拍五张。另外，不许拍帐篷以外的事物，更不许拍上校周围的人。”我这时才注意到卡扎菲两米远处一位老头正在用木炭煮红茶。再过去是位至少有 1 米 90 高高的彪形大汉，登伞兵靴，穿皮茄克，浓眉大眼，头上缠着贝都因人的包头。令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马超、马岱。

人们很难说卡扎菲在想什么，更无法预测他下一步将做什么。在短短几分钟里，他时而面无表情凝视远方，时而仰天大笑或勃然大怒声讨美帝暴行。我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像在可可西里拍野牛那样单膝点地，以避免因过分紧张而造成的抖动。看到我聚焦，像所有上惯了镜头的大人物一样，卡扎菲欠起身子披正了镶金边的阿拉伯长袍，用力吸了一口气，这一吸仿佛将帐篷中的氧气吸了个一干二净。

他见我拍了两三张就停了下来，就再次整理衣服，见我仍不动，就用缓慢的英语朝我问：“Any Problem（有麻烦）？”他那里知道他手下的人给我的命令是“只准拍五张”。

我哆哆嗦嗦地拍完这五张，倒退着退出大帐篷，蹲坐在地毯边缘，贪婪地注视着大帐内的卡扎菲上校。他真像一位沙漠君主，身体后仰，靠在棕色大皮沙发上，昂首挺胸，以至在相机取景器中占大量面积的是他那骄傲的下巴和狮子般的鼻子。这种情况我只在 1988 年 1 月采访阿兰·德隆时遇过，可阿兰·德隆霸道做作肤浅，带着一种演员特有的夸张的豪气。而卡扎菲上校昂首阔视却带有贝都因游牧部落自然的大漠气息。像恺撒大帝迷信红色一样，卡扎菲上校穿着一件大红的鳄鱼牌（LACOSTE）运动衣，外罩一件银灰色纱制阿拉伯长袍，袍的两襟镶了简朴的金边。伴随着缓慢的手势，上校时而英语、时而阿拉伯语侃侃而谈。在我眼中，卡扎菲上校是位受过良好教育、骨子里高贵儒雅、逻辑性强。

能熟练运用阿文、英文表达自己政治意图的政治家，由于民族和地理特点，带着迷人的传奇色彩。凝视着他高昂的头和轮廓分明的嘴唇，我想起身披红色战袍的恺撒大帝正对待从口授他的《高卢战记》。

不知不觉已过了 45 分钟，卡扎菲似乎注意到始终蹲坐在帐篷边缘、怀抱相机如痴如醉和他一样穿大红上衣的我。

上校朝我招手、示意我过去，并用英语说：“If you want You take any picture here（如果你想拍，你可以随意拍）。”我象一束紧绷的弹簧一跃而起，其感觉类似大赦了的囚徒。

采访结束，我走上前用英语问卡扎菲上校能否与他合影，他宽宏地仰天大笑，拉住我让我紧靠在他左边，我的右手与卡扎菲上校的左手十指交叉，紧紧握在一起。我就势掏出笔记本请上校为我签名，上校从桌上摸起一支大红“斑马”签字笔，挥洒出一片红色的阿文：“谨表敬意。穆阿迈尔·卡扎菲。”

他用左手将签名递给我，用右手拍着我的肩膀用英语说：“你可以卖100万。”言罢又哈哈大笑，我亦跟着开怀大笑起来。

卡扎菲上校将我们送出帐篷，中午与我们同机而来的黑皮肤少女正和其他五位同样的黑皮肤少女一起坐在草坪上，见我们走出来，便一起哈哈大笑，我抢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合了张影。放眼四望，我在寻找另一位同机而来的金发旅伴，可惜枯草莽莽，一无所有。就在我们钻进大奔驰离去之际，我突然发现她正站在夕阳里，满头金发随着撒哈拉的狂风上下飞舞，还是那身退色的牛仔套装，只是上衣脱去，露出柳腰间银光闪烁的手枪来。可陪同制止我照相，我一万个不愿意地将相机塞回包里。

黄昏，我们的总统专机从班加西机场直冲蓝天。我平躺在专机惟一的一张沙发床上，想象卡扎菲上校躺在这里的情景，耳边回荡着红袍恺撒的一句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窗外是波涛汹涌的锡尔特湾，远方，残阳如血。

第2节“非法入境”的前前后后

（一）

1992年6月22日，路透社、法新社等世界重要新闻机构同时播发了一条足以断送我前程的电讯：“新华社记者唐师曾驾吉普车自西奈非法闯入加沙地带，以色列南方军区追捕数小时后将其拘押。”以色列电台的新闻广播使我臭名远扬，继而是多米诺骨牌式的讹传——《以色列消息报》、《约旦时报》、《埃及华夫脱报》……远东的港澳报刊也一哄而起，可抓住一个敢在加沙折腾的中国倒霉蛋了，就连中国大陆的某大报也卷了进去。眨眼间，我成了驾MIG—25飞往函馆的别连科，或是从天降落在红场的鲁斯特。

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就在我的新闻同行绘声绘色描绘我在以军枪口下的种种狼狈之时，我却在特拉维夫阳光明楣的哈美利兹大道为沙米尔拍照。当这张新华社特拉维夫传真照片被《大公报》采用时，《星岛日报》还在做“大陆记者非法入境，以色列军队穷追数小时”的文章。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为何那天在我吉普车顶上盘旋的“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带着“陶”式反坦克导弹；而迎面挡住我去路的那辆M113装甲车上的7.62毫米机枪在瞄着我的脑壳。

（二）

我本应早些时候由开罗动身前往大选在即的以色列、可种种繁文缛节直耗到6月2一日中午才开亮最后一盏绿灯。当我驾车渡过苏伊士运河，横

穿整个西奈半岛驶抵埃以边境对，已是晚上 9 点。埃及边防军不许我靠近，命令我折回 55 公里以外的阿里什去住旅馆。可我一想到孤身摸黑横穿沙漠，总有点不寒而栗，多亏一位名叫埃尔桑的埃军准尉，破例让我将车停在哨所的灯影里，我感激涕零地掏出红茶，香烟、清凉油分给弟兄们，说尽我所会的所有表示感谢的阿文单词后才钻进吉普车后座的睡袋里。

我开的是辆 1991 年款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广东人称之为“沙漠王”。线型排列 6 缸 4500 毫升“3F”汽油发动机和沙漠色的防热漆，是专门为海湾产油国设计的，其公路水平速度可达 180 公里/小时，负重爬 30 度陡坡，超“奔驰 260”如探囊取物，更不用说沙漠越野了，我曾让它的前轮爬到胡夫金字塔的基座上。从红海到地中海，我驾着“无言的战友”跑遍整个埃及，我管它叫“长腿沙漠跳鼠”。我说过我嗜吉普如命，驾校学的是吉普、追大熊猫坐的是吉普、青藏高原探险开的是吉普、海湾战争在返安曼—巴格达的还是吉普。三

我喜欢开吉普一人远行，任意在沙漠上驰骋，寻找汉尼拔、巴顿、隆美尔、巴列夫们鏖兵的遗迹，缩在吉普车里露宿。

入夜，沉重的喀新风卷来上万只伊蚊，吹着“军号”向我轮番进攻，害得我将清凉油通体涂遍，权当驱蚊剂。刚刚入梦，又被值勤的埃及哨兵弄醒，让我分享滚烫的煮红茶，从此再也没睡踏实。接连不断的噩梦、驱赶不走的蚊群的尖啸犹如当年的“飞毛腿”警报一般彻夜不停。

在边境熬过一个难眠的仲夏夜，已是 22 日凌晨，离以色列大选还有 24 小时，可我还未踏上以色列国土。和埃及边防军挤在一起啃阿拉伯大饼，远眺沙漠旭日冉冉升起，景致虽好可味同嚼蜡，心急如焚。

在埃尔桑准尉帮助下，我好歹办完了离境手续。埃方收走了我的所有物品的证明文件：包括汽车、相机、放大设备、传真机过关证明、吉普车行车执照及汽车号牌，只将护照还给了我。我大惑不解地追问没有行车执照和号牌的汽车能否上路时，一位便装男子朝以色列方向一指：“那个操蛋国家（Fucked country）会给你安个新的。”

我开着这辆没有牌照的大吉普咆哮着冲出埃及，就像当年乔治·巴顿强渡莱茵河。现在惟一能证明汽车身份的是前风挡上手提相机狂奔的卡通人唐老鸭和我手书的拳头大小的英文：xinhua NewsPhoto（新华新闻摄影）。

穿过 100 米长的全封闭地带，眼前是高悬蓝白大卫星旗的以色列边境。蛇腹铁丝网后面蹲坐着头顶钢盔、戴墨镜、穿防弹背心、挥着大毛胳膊、平端 M-16 步枪的以军。

摇下国窗，右手戳向太阳穴，来了个联合国军式的敬礼，摘下墨镜，有海湾战争中学来的两句半希伯来语大喊：“沙巴沙龙！（安息日好）那条路通耶路撒冷？”一位小个子士兵倒背起 M-16，朝我回了个巴顿式的军礼，咧开大嘴：“照直走，日本人！”边喊边跑到角铁焊成的拒马旁，移开挡在路中央的横杆。

在我前面是辆 MFO（多国部队观察员）的大号雪佛莱，还有一辆 UNTSO（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的大吉普。

在中东，军车在值勤或集体调动中，不论昼夜都是开亮大灯的，美军、伊军、以军……全是如此。我前面的两辆军车分别属于挂玫瑰红旗的多国部队和挂蓝色联合国旗的联合国军，尽管风马牛不相及，但同样亮着大灯，我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伴随汽车收录机中瓦格纳辉煌的旋律，我的沙漠鼠以 120

公里的时速狂奔着。沙漠太阳升起来，我放下遮阳板，戴好波拉墨镜，可映在引擎盖上的另一个太阳照样刺得我双目微合。踌躇之际，雪佛莱和大吉普一左一右拐下公路绝尘而去，公路上只留下我单人独车疾驰突进。

继续前行，道路更差，以军哨卡却渐多，往来全是包了铁丝防护网的军车。途经一片桔林，劈头盖脑飞来一阵石雨，紧接着砰然一声巨响，一块比拳头还大的水泥块正命中我前风挡上端。显然，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错把我当以军了。在以色列，汽车牌照共有五种：7 位数黄牌为正宗以色列人；6 位数黄牌为以色列本土的巴勒斯坦人；白牌为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蓝牌为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绿牌为巴勒斯坦人的出租。而我驾的车没有任何牌照。我加大油门选择东北方向最宽的道路落荒而逃，根据闪击战理论，速度可以改变一切劣势。我慌不择路，直到落满尘埃、死气沉沉的“欢迎来加沙”横幅从头顶上一掠而过，我方意识到我已单枪匹马穿过了加沙城。

看一眼手腕上的指北针和右座上的公路图，阿什克隆已经不远，离特拉维夫不足 200 公里。就在我暗自得意之际，一辆兰德·罗孚警车将我别出公路，一辆 M113 装甲车威风凛凛地横在我面前。

四

我就这样被押进了加沙检查站与阿什克隆之间的一家警察局，我的大吉普像外星飞碟一样被看管起来。一位长得颇像林肯的警察中校收走了我的护照：“你有权保持沉默...”就像警匪片中的纽约警察。

显然，警方对我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破“世界第一陆军”防线，纵深以色列几十公里大惑不解。尽管我的护照和以色列签证合法齐备，可就是连人带车奇迹般地越过了边防和海关。

“你不是第一次开车出国旅行吧？环球旅行家？”警官掂着我厚厚的护照讥讽道，“那是，”我堆起一脸的灿烂，“不过，那是从巴格达开到安曼，您知道，约旦和伊拉克就像亲兄弟，何况天上还有多国部队的轰炸机，战争状态。我还从开罗到过的黎波里，那是做卡扎菲上校的客人，而利比亚与埃及间根本不设边界。贵国虽说来过，可乘的是特拉维夫私人运动飞机，海湾战争使贵国的所有航班全停了。在希尔顿顶层我拍到了“爱国者”迎击“飞毛腿”，还在拉马特甘炸飞的民居前撞上了阿里尔·沙隆.....”“难怪有这么大胆子。”警官撇嘴揶揄道。我借机献媚：“是以色列造就勇敢的人”一句话逗乐了警察中校。警官继续翻着我的新华社记者证问：“你在哪儿学的车？”“北京警察学院。”“那咱们还成同行，难怪追了你半天。”他指着记者证扉页上与我并肩合影的苏大爷（苏仲祥，原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问：“他是你师傅？”“哪儿敢呀！他是北京市公安局长。”中校端详了一阵，喃喃自语：“像个好警察，怎么，他管区人口是以色列全国人口的两倍半？”我将警官的笔录看了两遍，确信没有对我不利之处后才在右下角签了名。警官将笔录夹入卷宗：“对不起，国防军的先生们已经在外面等得不耐烦了。我想你得跟他们走。”我知道事已至此，只有听天由命。不过我有权用电话通知一下新华社耶路撒冷分社。警官阻止我说：“不必了，你已经上了电台，全以色列都知道‘飞人使南方军区跳了起来’”可我仍坚持给耶路撒冷首席记者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现在的坐标。

五

出警察局，两辆包着防护网的国防军吉普车紧逼着我的大吉普，整整两车头顶包了迷彩布的孟型钢盔、穿开福拉防弹背心的国防军，虎视眈眈地坐在车上。一位坐在驾驶座上的少尉朝我一挥手：“Flyingman, Followme!”

（飞人，跟着我！）两车国防军一前一后押着我沿加沙公路驶向西南。看着右侧的沙漠太阳由白变红，我几次轻踏油门企图超过前面慢吞吞的军用吉普，可都被摆动着加里尔步枪的国防军逼了回来，黑洞洞的枪口晃得我胆颤心惊。驶入一个小村，国防军作出密集编队的手势，看着他们脚登车帮，向四面八方端起一支支加里尔步枪，吉普车成了向四周乍刺的大刺猬，显然将通过一段由巴解控制的地段。果然，石块从天而降，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又高高弹起，以军开始还击，跳跃的弹壳落在我大吉普的引擎盖上。急转弯时，前面军车尾部丈把高突突乱颤的鞭状天线竟横抽到我的前风挡上。

我被带进一个四周筑有沙墙的阵地中，只能看到了望塔上操纵比利时Mag 机枪的两个哨兵和懒洋洋下垂的大卫星旗。我被命令将所有物品搬到沙地上，由一帮我认为军警宪特外加摩萨德的人员仔细检查。我真羡慕他们有如此的耐心，连我车内的装饰板都拆下来，推敲夹层里是否藏了武器，我器材箱中的几瓶显影液被怀疑是“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Cocktail，一种著名的汽油燃烧瓶）。

一位戴眼镜者发现我的两台尼康 F3 相机备忘插上分别是我与卡扎菲、阿拉法特的合影后而格外警惕。我坦然地解释说：“我是个在动荡地区拍新闻照片谋生的人；当然，我是个很守法的人。不过，在那些不按规矩打牌的地方得学会自我保护。在北非，没有哪个恐怖分子敢绑架卡扎菲上校的朋友；在加沙地带，有一张与阿拉法特的合影，至少可以不挨石头。”显然，国防军已经相信我是个货真价实的摄影记者，而造成我“非法入境”的主要原因是边境上的哨兵。尽管我是个无辜受害的可怜虫，可国防军仍坚持要把我押回边境，重新演练一番过关程序。“因为这对你我双方都至关重要，以色列国防军决不允许任何人突破自己的防线。”

六

我至今仍觉得这不是一般的意外事故，因为当我被以色列国防军押回埃及以边境时，埃及仍拒绝将我的各种过关文件移交以色列。埃及双方无休止地讨价还价，埃及坚持最多只能提供各种证明的复印件，而以色列则非要原件不可。

我和我的大吉普被搁在边界上，一名端 M — 21 的狙击手远远地喝令我呆在车上别动。

我深知这种加瞄准具。因越战而闻名的步枪的威力，其 7.62 毫米的铅弹随时可以把我轰在界碑上。我乖乖地坐在驾驶座上，可一张生就的硬嘴兀自不服：“战俘还享受日内瓦公约，可我现在像是在奥斯维辛。”我正全神贯注地与狙击手用手比划，一位戴“边境联络”臂章的军官从天而降在我车前：“国防军中校摩西。达扬为您服务。”他见我惊讶地闭起一只右眼看着他，便儒雅地露出一口白牙：“的确，我与那位独眼伟人同名同姓。我想通知您，尽管埃及仍拒绝移交原件，可我们欢迎您来以色列采访大选。”一位便衣青年变戏法般地锯了两块三合板，用珠笔在上面写了“14614”；找了段铁丝拴在我大吉普的保险杠上。此时，由耶路撒冷赶来营救我的新华社驻以色列记者李红旗，已站在海关的另一端向我招手。

七

路透社 6 月 23 日特拉维夫电：“以色列军方今天纠正了中国记者自埃及边境闯入加沙地带的说法。军方在一份声明中称，中国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并未如早些时候报道的闯入以色列境内，他只是未受到哨兵的常规检查而已。国防军发现哨兵的错误后，四处搜寻师曾先生，将其带回拉法边境站接受例行检查后已准许其入境。早些时候军方曾声称已将师曾先生驱逐出境。”

以上这条电讯被 6 月 24 日《以色列消息报》《约旦时报》同时采用。

在特拉维夫一个宴会上，我被引荐给以色列总参谋长、陆军上将巴拉克。这位娃娃脸、有 35 年军龄的巴拉克将军是被授勋章最多的军人。巴拉克幼年在东欧因纳粹屠杀失去双亲，移民以色列后投身军旅；偷袭、救人质、反劫机屡战奇功。1973 年他还亲自头戴女性假发、化装成阿拉伯妇女，率一支突击队袭击了阿拉法特驻黎巴嫩总部。对全世界恐怖分子来说，他是惟一的克星。当我的好友、记者李红旗把我推上前，告诉上将这就是那个惹过阿齐兹、搂过卡扎菲、开车闯过国防军阵地的小伙子时，这位以军的最高长官哈哈大笑：“我喜欢！我喜欢！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作者又及：1995 年拉宾被刺后，巴拉克出任以色列外交部长，1997 年 5 月出任以色列工党领袖。如不出意外，也肯定是未来的以色列总理。）

第 3 节我所知道的阿拉法特

1991 年 1 月 7 日，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海湾战争一触即发之际，阿拉法特是举世惟一公开表示站在巴格达一方的政治家。当时，我才突然发现面前这位叱咤风云的中东名人身高竟然只有 1.60 米，这与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课堂上得到的印象大相径庭。在此后的三年里，我作为新华社中东分社摄影记者，先后几十次为阿拉法特拍照，由近在咫尺到勾肩搭背，得意地看着美联社、路透社的摄影记者们朝阿拉法特大喊：“看这儿！阿拉法特！”

没有国土的元首

阿拉法特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没有国土的国家名首，1929 年出生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他的名字阿拉法特，就源自耶路以老城附近的一座山峰，原意为“神与吉祥”。我曾先后四次爬到该山山顶，体会耶路撒冷的神圣。

早年，阿拉法特之父由于从事反对英国殖民者和犹太人的统治而背井离乡远走开罗，从此阿拉法特一家不得不四处漂泊。阿拉法特四岁丧母，童年的诸多不幸养成他固执、坚韧的性格，崇尚武力。由于与生俱来的领导天赋，自少年时代起，阿拉法特就成为巴勒斯坦儿童的领袖人物。

从埃及开罗大学工程系毕业后，阿拉法特在科威特开设了自己的建筑承包办事处，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心经营，他开始拥有了七辆汽车和一座别墅。优越的物质生活无法使阿拉法特成为池中之物，他梦系魂牵的是故乡耶路撒冷那座与他同名的小山。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的 1958 年，

年仅 29 岁的阿拉法特在科威特秘密建立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法塔赫”。七年后，他领导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开始武力反抗以色列统治被占领土，巴勒斯坦革命由此爆发。

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由于“法塔赫”坚持以各种手段反抗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统治，阿拉法特被视为头号恐怖分子，无法返回自己的故乡耶路撒冷。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爆发后，为配合阿拉伯联军与以色列的正面作战，阿拉法特化名“阿布·奥马尔”，秘密潜回约旦河西岸的纳布卢斯领导地下抵抗运动。

阿拉法特的身高在人高马大的阿拉伯世界显得有些矮小。这位四处漂泊的政治家一年四季总穿一身墨绿色的军便袋，上衣扎在军裤中，腰悬左轮手枪，系军用武装带。阿拉法特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对于十几年来签署的每一份文件记忆犹新。两年前，在开罗外交部与埃及外长穆萨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阿拉法特不假思索地向我背诵十多年前的联合国 242 号决议，内容原文。在与阿拉法特的交往中，我觉得他是个感情外露又好激动的老头，干厚的大嘴唇微微凸起，持久地微笑着，在中东各国的国家元首右，阿拉法特是取乐于和摄影记者合作的一位，每次公开露面都有一大帮摄影师乱哄哄地摆布好：“看这边！阿拉法特！”“再握手，阿拉法特！”而阿拉法特总是宽厚地满足大家的要求，邹起大鼻子，半眯起眼睛，咧开嘴唇憨笑。使得整个面孔随之缩短。当他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暴行时，立即双睛凸起，脸部鼓得像一只充足气的皮球，伴随着怒吼，右拜食指在空中乱舞。

阿拉法特总是头缠黑白方格或红白方格阿拉伯头巾，主耳露出，脖子上紧围着另一条同样图形的头巾，塞在军便良衣领里。阿拉法特的头巾围法与北非撒哈拉人、苏丹努比亚人、也门人、贝都因人及海湾各国的围法不同。在非统画家首脑会议上，我与列席会议的阿拉法特再度相遇，这天也围的是条黑白相间的方格头巾。当我问起他与众不同的围法时，他严肃地解释：“这是我的风格，阿拉法特风格。”据兑这种只露左耳的围法使头巾呈不规则的巴勒斯坦地图形状：“白格代表城区居民，红格代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黑格代表农民。”尽管阿拉法特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没有国上的国家元首，而代表其国土的围巾却日夜顶在他的头上，他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一些国家将阿拉法特称为恐怖活动的鼻祖时，经验相的阿拉法特却得意地为自己嗅觉灵敏的大鼻子得意。

妻轻时的阿拉法特的确用尽各种暴力手段打击以色列，因蠢扭色列总理贝京将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PLO）称为“暗速辛迪”。以色列的另一位总理沙米尔干脆称阿拉法特少心怀无穷仇恨的人，正在完成阿道夫·希特勒的未竟事业”。

不久前，一名前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在（Ht）周刊上承认至少有四次他完全有把握将阿拉法特置于死地，由于各种原因，全让阿拉法特躲了过去。作为巴解主席的阿拉法特，几十年来一直是“摩萨德”刺杀的头号目标，可谓险象环生，阿拉法特总是凭借超人的第六感官，从敌人瞄好的枪弹毒药旁滑过去，化险为夷。这还不算阿拉法特家里同室操戈的兄弟。

象 1969 年初，一名被以色列“摩萨德”买通的巴勒斯坦人走至阿拉法特身边，在阿拉法特的坐车上偷装了窃听器和波型脉冲雷达发射器，企图以此为以色列战斗轰炸机指引目标。可阿拉法特凭直觉及时发现了这个装置，